

钱国红 著

走近“西洋” 和“东洋”

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

 商务印书馆

走近“西洋”和“东洋”

——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

钱国红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钱国红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 - 7 - 100 - 05807 - 0

I. 走… II. 钱… III. 思想史 - 对比研究 - 中国、日本 - 近代 IV. B250.5 B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16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走近“西洋”和“东洋”

——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

钱国红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807 - 0

2009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28.00 元

代 序

依田憇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笔者与钱国红氏的相遇可上溯到1988年。

由于笔者有缘很早就与中国历史学界有过接触,也由于笔者专攻日中关系史和近代化比较研究,自改革开放,中国学者开始来日本以后,许多年轻学者就来到笔者研究室从事学习和研究。

钱国红氏是其中一人。他作为南开大学吴廷璆教授指导下的博士生,因共同培养,以笔者为日方指导教授,来到早稻田大学我的研究室待了将近三年,专心从事学位论文的写作。

最初和他就毕业论文进行谈话时,我考虑到他已经在思想史领域钻研很深,建议他就佐久间象山和魏源进行比较研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一)这两个人同样生活在19世纪中期,活跃于东亚近代化的初级阶段;(二)两人同样对两国以后的思想给予了很大的影响;(三)两人同样在最初接受过儒家教养,但后来开始关注欧美文明,并强烈主张接受外来文明的影响;(四)魏源的《海国图志》曾被以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荫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人阅读,给他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五)尽管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以后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六)在日本,人们往往只关心佐久间象山作为洋学家、思想家的一面,对他

2 走近“西洋”和“东洋”

作为儒学家的研究还比较少,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愈发显得重要。再加上钱氏是湖南人,老家离魏源老家很近,这也是推荐他从事这一研究的理由之一。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以鸦片战争和培理来航为契机,共同以 19 世纪 40—50 年代为各自的出发点。同时,后来两国近代化的发展速度又有了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笔者认为中国和日本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除了来自各列强的压力强弱不一以外,还有两国统一市场形成与否的差异。当然也可以说,是否针对各列强的压力作出有效的反击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国内统一市场是发展国民国家、民族和资本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考察西欧近代国家产生过程,可知在封建割据状态(无论其是由诸侯进行的分割统治还是“郡县”式的中央集权形态)的国家里,首先形成包含其大部分国土的国内统一市场,然后,在此基础上诞生以国王为中心的强大的统一国家。在历史学中被称为“专制主义”的这样的国家,其本质虽然仍然是封建国家,但可以成为形成下一个阶段的近代国家的坚实前提。英国近代国家和法国近代国家都是在通过革命打倒英国专制主义、法国专制主义基础之上得以成立,是在各个国家专制主义统一国家遗产基础之上得以形成的。由此可见,专制主义是近代国家成立的重要前提,具有这个条件的国家比较容易过渡为近代国家。同时,由于国内割据势力强大、外国干涉严重等等理由,导致无法形成专制主义的国家,历史证明是很难过渡为近代国家的。

在日本,虽然幕藩体制下统治组织处于分权状态,但德川中期已经基本形成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统一市场,包括虾夷、琉球在内,日

本基本被编入统一市场框架之内。要求以这样的统一市场为基础实现统一国家的呼声日益强烈。幕末的尊王论和国学即具有谋求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统一国家的内容。因此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形成了具有近代国家前提性格的统一国家(专制主义),在此基础上,谋求近代国家的倾向得到强化,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下,虽然还保留了许多前近代要素,但最终拥有了宪法和议会,基本实现了具有近代国家性质的明治宪法体制。与中国相比,日本只拥有很小的国土,而且四面临海,江户时代中期的交通手段是以海运为主,这比较有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因此,日本从具备前提性的统一国家到近代国家本身可以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解决各个阶段面临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广大国土的内陆国家,当时的交通手段不利于形成统一市场,因而缺少进行近代化的重要前提。这种状况削弱了清朝中央的权力,加强了割据势头。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以后,带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沿岸与内河川的汽船运输和铁路运输得到相当规模的发展,开始真正出现了以中国本土为范围的统一市场,形成了产生近代国家的重要前提。而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民族意识的高涨,北伐革命以后出现的地方军阀走向没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所显示的强烈抵抗,都与以上所述近代国家重要前提的成立不无关系。

西欧各国和日本等国家之所以比较顺利走上近代化道路,是因为具备了分阶段解决近代化过程所面临问题的条件。中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面临许多困难,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缺乏有力的前提条件下,

4 走近“西洋”和“东洋”

要同时解决诸多课题。这可以说是我通过比较分析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而得出的结论(详细内容可参照拙著:《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日本比中国早一步介绍欧美国家制度(朽木昌纲的《泰西輿地图说》,1789年),再加上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洋学作为“学问”获得了市民权,在以后的近代化过程中,这为日本提供了远远优越于中国的前提条件,但其在社会科学方面曾受到统治阶层的镇压,内容也偏重于科学技术。因此在有关国际形势、欧美的国家制度、近代思想方面,在香港、上海发行的洋务书和汉字报刊对幕末日本的影响更大。读过魏源《海国图志》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视该书的记述为“儿戏之为”,但在其他方面却不得不给予很高评价。当时日本能直接读洋书的人还很有限,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却都有阅读汉文书籍的能力,他们可以从上述洋务书和汉字报刊直接吸收很多知识(同时由于洋学也具有“市民权”,这些洋务书和汉字报刊比起在发行量大的中国,在日本产生的影响更大)。福泽谕吉于庆应二年(1866年)出版发行《西洋事情》,销售之火暴,前所未有的。在此之前,从魏源《海国图志》曾出现过许多日本版本这一事实可知当时日本有关欧美情况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洋务书籍。而福泽谕吉的著作却是这方面用日语撰写的真正的介绍欧美的书籍。该书惊人的畅销与全书用日语写成,因而进一步扩大了读者阶层不无关系。

同时,福泽谕吉《西洋事情》的出版发行,也显示欧美知识进入东亚的窗口从香港、上海渐渐向日本转移。明治维新以后,包括思想在内的欧美知识有许多是经过日本进入中国的。卢梭、孟德斯鸠、穆勒等人的著作在进入中国之际,多从日译本重译。此外,日本明治二

十二年(1889年)实现“立宪政体”一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了变法维新阶段撰写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翻译书籍的目录介绍给中国,关于此事,他在写给弟子梁启超的信里强调说:日本文字是中国文字。尽管其稍微夹带有空海发明的假名文字,但只有十分之三程度。而西洋诸学之书主要部分全部已经译成日语,故我们尽可以借用其成果。

围绕着对魏源和佐久间象山的研究,还有作为背景应该加以把握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日两国对儒学有效范围程度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关于这一问题,两国之间的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日本,包括在日本的儒学家之间,儒学形式化现象特别突出,人们具有较强烈的要限定儒学有效范围的思维意识。

在过渡期时代,固有的统治思想往往都主张自己的有效性是万能的。在欧洲基督教神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时代,曾经有人站在圣经“天动说”的立场上,对新兴的“地动说”进行过残酷的镇压。

江户时代对儒学全面有效的主张主要来源于最具完整体系内容的朱子学理论。朱子学主张上下关系是贯穿于自然和人类社会双方的原理,因此以确立日本朱子学而闻名的林罗山在接触当时来自欧洲的地球仪时,就曾认为地球仪违反天上地下或天圆地方的原理而对其加以否定。

另一方面,江户时代从初期阶段就已经有了古学、阳明学的同时存在。这显示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寻求全面有效性的思维已经开始出现动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把理看成是世界精神体现的朱子学,把理看成是“条理”的古学在日本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6 走近“西洋”和“东洋”

活跃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荻生徂徕(1666—1728年)从朱子学批判这个角度出发,论述道:“先王之道即安天下之道。其道虽多端,终归于安天下。”他还说:“先王之道,先王之所造也,非天地自然之道也。”^①“所谓圣人之道专指治国、治天下之道,而于事物当行之理之中无之,天地自然之道中亦无之”^②。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主张的“安天下”之事与“天地自然之道”、“事物当行之理”没有关系这一点。如在朱子学中可以典型地看到的那样,当时儒学是主张其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有范围的有效性的。而依徂徕之主张,儒学的有效范围完全被限定在政治方面,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理念方面。而且,由于儒学的有效范围被限定,“天地自然之道”、“事物当行之理”存在于其有效范围之外,这样,有关它们的追求就必须另外进行,就必须承认儒学之外的“学问”的存在。徂徕有一句名言说道:“学问在于广泛摄取,在于增长自己的见识,”^③这句话也如向来所解释的一样,意味着徂徕从一味追求封建伦理为学问的固有学问观中解放出来,又由于对儒学有效范围的限定,也可以说解放了全部的学问^④。从徂徕的下一代开始,日本兰学变得繁荣起来。这是因为此时儒学的有效范围已经加以限定,尤其是“天地自然之道”被置于其范围之外,以自然科学为主轴的兰学也就很早得以被认定为“学问”了。

此外,与徂徕同时代的学者新井白石虽没有像徂徕一样从正面

① 《辩道》。《荻生徂徕全集》第1卷,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这种观点在徂徕著作中随处可见。

② 《答问书》。《荻生徂徕全集》第6卷,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

③ 同上。

④ 就主张合理地、有目的地研究广泛范围内的问题及承认欧洲学问的价值方面来说,新井白石也可称为是一位西洋学的开拓者。

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但可以说,他通过超越旧儒家所追求的学问范围,寻求对广泛领域进行学问研究的方式,事实上限定了儒学本来的有效范围。同时,也可以说白石的立场在于通过扩大用“理”进行分析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形成了使被分析的“理”的内容产生变化的契机。

这种倾向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儒教的形式化”也得到持续推进。

如本书作者在他其他几部著作中所说的一样,一贯把自己看成是朱子学家的佐久间象山实际上把朱子学“理”的有效范围限定在狭义的道德之上,同时通过把西洋的“理”作为“世界共同之理”来取代朱子学的“理”,形成了向欧美学习的积极姿态。他认为象山的所谓“东洋道德”并不像过去有人主张的那样具有广泛的范围,其内容实际上是极其有限的。我认为钱国红氏的这一观点很值得注意。这说明自江户时代中期到幕末为止的日本思想界的主要动向是一个通过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而扩大“学问”范围的过程。象山即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先驱。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在中国尽管出现了像魏源那样超越原有价值、发现新价值的思想家,但由于当时中国儒学的有效范围不像日本一样得到严格限定,中国人在吸收欧美文化之际遇到了很大困难。

在中国,国家组织通过科举而形成,科举通过儒学付诸实施。这种场合,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这意味着限定中华帝国或中国皇帝权威的有效范围,可能被看作为“危险思想”。而在不存在科举制度的日本,却可以比较自由地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

最近以来,从不同角度就亚洲近代化进行研究的种种尝试大大深化了对亚洲近代化问题的认识,而从不同角度对日本和亚洲诸国

8 走近“西洋”和“东洋”

的近代化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更深刻地阐明“近代化”本质意义的途径之一。期待这样的研究今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我想谈一下从历史来看将来的中国应是怎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亚洲的文化大国,包括日本的中国周围国家是汲取了中国的文化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的。虽然有几个时期北方的民族在武力上优于中国,但即使是这样的时期,中国也仍没有失去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

但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最不幸的就在于失去了亚洲文化大国地位。而在此以前,中国即使在战争中失败,也没有失去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但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中国失去了这一地位。为了摆脱鸦片战争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近代中国的许多先觉者进行了艰苦的奋斗,现在这一目标已实现。现在中国最大的课题就是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我强调最大的课题是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并不等于说不要成为其他方面的大国,而是说从历史来看,中国要想被公认为世界大国,这一方面是最重要的。我反对首先发展经济,文化问题容后考虑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规律的。日本在二战失败时,由于大战末期的轰炸,其产业大部分丧失,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当时首先被提出的课题就是“建设文化国家”,这一点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都有反映。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国民从以前的军国主义失败中吸取教训,把新的方向指向建设文化国家,而不是“经济大国”。但是,结果是日本成了世界的经济大国。也就是说,以文化国家为目标,结果却成了经济大国。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历史的规律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曾有过急速的经济发展,这得益于江户时代日本已是当时

世界上(包括农村)的全国平民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当时的农村直至中农阶层都具备了日常生活所必要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以此为基础的明治维新以后的义务教育(1900 年左右,日本男女儿童的入学率已达 90% 以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后日本的急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战后就开始普及的至初级中学的义务教育。由此看来,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现在经常听到要使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声音,而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的声音则不太能听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正在发展中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其经济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就可以获得世界的称赞。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它如果只有经济的发展是不能获得世界的称赞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理所当然应当是一个文化大国,若不是的话,这就令人奇怪了。因此,我认为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将来,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是最大的课题。

21 世纪被认为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文化大国同时也就是成为世界的文化大国。在此前的时代,只要人口中比较少的部分具有了突出的较高层次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性,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文化大国。但在现在,要想成为文化大国,就必须使文化普及到国民大众的末端,而且积极地吸收广泛的世界文化方有可能。

(钱光中译)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5
一、黄河文明和海洋文明	5
二、从发现海洋到形成新的世界意识	7
三、儒学与近代化	14
四、“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	20
第一章 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	23
一、大航海时代与东西势力的交替	23
二、地图上的日本和世界	26
三、俄罗斯南下与日本人的海国意识	30
四、利玛窦的万国全图	43
五、《三才图会》中的世界意识	49
六、清朝中国的俄罗斯印象	54
七、世界的扩大与海洋	60
第二章 中国·西洋·日本:三角测量的视角	73
一、观察世界的起点	73
二、来自世界的憧憬和威胁	98
三、西洋认识的深化与对传统世界的批判	163
第三章 《海国图志》的冲击和幕末日本	191

2 走近“西洋”和“东洋”

一、中国知识分子和鸦片战争	191
二、日本知识分子和鸦片战争	216
三、来自中国的世界地志与《美欧回览实记》	226
第四章 走向世界：中日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	236
一、从“夷务”到“洋务”	236
二、立志研究日本的晚清中国人	258
三、超越洋务运动	265
四、从文化争论看近代中国的他者发现和自我发现	288
五、大洋上的对话——中日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	294
六、制约近代化方式的世界观转型	320
第五章 两个文人知识分子：魏源和佐久间象山	328
一、中日两国近代初期思想的比较	328
二、魏源和佐久间象山的理想与现实	342
三、东方文明观和中日两国近代化	353
结语 中日近代化的世界史意义	365
一、扩大近代化可能性的三角测量思维	367
二、反思与展望	372
附录一 魏源和佐久间象山及所处时代中日大事 年表	378
附录二 本书参考文献	390
附录三 索引	395
后 记	410

前 言

儒家经典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段文字是过去士大夫学者做学问的最高目标和神圣使命。换成现在的通俗说法,也就是说,做学问或做人都应该重视个人教养的修炼,要重视家庭的稳定、国家的安定和天下的太平。当然,不同时代的个人状态、家庭状态或国家形态以及世界构造都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古代中国人或当代中国人重视世界(天下)、国家、家庭、个人的价值取向恐怕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儒家的经典概念与人生体验的过程也是基本吻合的。一个人自出生以后,通过和父母亲以及家庭成员的接触慢慢获得“自我”意识,随着他(她)成长为一个青年走进社会以后,他(她)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谋求建立一个“家庭”,然后为了家庭,他必须开创一番事业,于是,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他开始思考“国家”这个社会统治形态与自己的关系,最终,他会发现国家不是孤立的,每个单独的国家都是在众多的国家和国家(“世界”)的关系之中得以存在的。当然,尽管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多多少少对“自我”、“家庭”、“国家”、“世界”进行过思考,但思考的质量和深度却因人而异。而对“自我”、“家庭”、“国家”、“世界”的不同思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以及人生选择。造成个人对“自我”、“家庭”、“国家”、“世界”的思考出现差异的原因很多,人们的个性,其所处的时代环

2 走近“西洋”和“东洋”

境、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几个因素。

最近,日本朝野上下围绕是否把“爱国”一词写入教育基本法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样的议论有助于加深对世界、国家、个人关系的认识;也有人担心过分强调“爱国”,会不会导致日本重新返回战前教育体制;当然,还有人认为这正好是使日本实现成为“普通国家”这一夙愿的一个机会。

面对日本社会围绕“爱国心”表现出来的动向,亚洲邻国也不无警惕。一些舆论认为这种动向是一部分日本人希望复活国家主义的信号,呼吁人们提高警惕,加以注意。明治时代以后,日本在亚洲最早实现近代化,也最早成为军事大国,但由于当时的日本不是以和平发展为国家目标,因而最终走上悍然侵略亚洲的道路,招致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下场。亚洲各国人民都明白,日本近代化之所以如此曲折,与明治以后日本社会风行一时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不无关系。更为严重的是,最近以来,日本社会除了频繁出现爱国主义论调以外,还有一部分政治家赤裸裸地发表不承认二战失败的言论,这更加深了各国人们对日本是否重蹈覆辙、复辟军国主义的疑虑。

如前所述,有关“世界”、“国家”、“个人”的观念,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人们最为重视的思维范畴。人类为了维持一定程度的文明生活,必然要思考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什么是国家以及世界。同时人们也不能超越自己的知识能力、自己的智慧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活动去理解自己和他人或国家和世界。对世界、国家具有整体性认识的结果有利于人类的和谐生活,并影响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相反,则会导致人类社会走向颓废,或者引起战争以及环境破坏。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即是反复对世界、国家、个人加以

理性认识的过程。

当然,抽象地议论世界、国家、个人,我们往往只能从字面上得到一些模糊印象,因为现实世界上并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和完全相同的人,也没有两个永远不变的国家或个人。我们只有不断地把世界、国家、个人的书面概念跟具体世界的构造、国家的状态、个人的活动进行对照分析,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国家、个人概念作出最新定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断谋求对旧的历史概念给予崭新定义可谓是历史学家的永恒主题。

为了认识今天和预测未来,我们必须正确地把握过去。为了了解中国和日本的现实和未来,就必须从学术角度对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有关世界、国家、个人的具体认识和观念形态进行严密的追踪分析。只有在中日近代化历史的大环境中,我们才可以准确把握今天中日关系出现的问题,乃至理解最近以来在日本社会突然浮现出来的“国家主义”、“爱国”、“普通国家”等观念范畴的真正含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构思就是在上述理论思考下完成的。除此以外,十几年前笔者走向日本的留学经历也与本研究的付诸实施不无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作为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踏上外国之地日本列岛时,我看到的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现代化的日本。我当时的心情也许和本书提到的19世纪后半叶,最早到达大英帝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不无相似之处。我仿佛觉得那时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对英国“富强”感到惊叹和迷惑的光景,似乎百年以后化成我对邻国日本的求知心和好奇心再现眼前。我不止一次在内心问自己,同样一个东方国家,同样经历了近代化洗礼的邻邦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距离和差异,这样的差距究竟